

吉鸿昌

**外孙女郑吉安:每当看到外祖父的遗书,都很悲痛**

在红楼的展室中,凝望外祖父——抗日英雄、爱国将军吉鸿昌的遗像、遗书,郑吉安的眼中渐渐闪动泪光。

“今年,距离他牺牲已经92年了。”郑吉安说,每年在清明时节以及他牺牲的日子,家人都要举行纪念活动。她介绍说,外祖父的遗体现在归葬于河南郑州烈士陵园,“在天津烈士陵园也有一个他的专门展馆供凭吊;红楼开放后,我们也会在中心公园的塑像以及红楼旧居中举行纪念仪式,缅怀、传承他的精神。”

这栋位于花园路4号的小楼于1930年被吉鸿昌将军购得,翌年将军举家迁入。1934年,吉鸿昌将军在天津国民饭店遇刺被捕。吉鸿昌被捕后,妻子胡红霞多次尝试营救,并及时公开了国民党企图暗杀抗日将领的卑劣行径,许多进步人士都呼吁释放吉鸿昌。将军牺牲后,胡红霞将小楼抵押出去,凑了8万元费尽周折赎回遗体。

如今的红楼里,有一间屋子被辟做专门展室,介绍将军牺牲前后的故事。“恨不抗日死,留作今日羞。国破尚如此,我何惜此头!”看着这首《就义诗》和直面枪口坐着死的雕像,郑吉安心潮澎湃,“尤其是我每每看到外祖父留给外祖母的遗书,那种悲痛的感觉,并未随着时间而消逝。”她用手慢慢抚摸展板,还轻声念道:“红霞吾妻鉴:夫今死矣,是为时代而牺牲……”郑吉安动情地说,外祖母与外祖父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,当年外祖父抗击日寇的时候,外祖母冒着生命危险,把武器弹药送到了前线,“他们是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。”郑吉安的声音微微颤抖,但音调无比坚定。

红楼对于吉鸿昌将军来说,既是家,也是革命基地。在一间“会客厅”的墙上挂上一幅壁画,画中展现了这间屋子当年发生过的事情。“当时,他们在这里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,外祖父担任主任委员。”地下党的秘密会议时常在这间屋子召开。记者问及原因,郑吉安让记者数数屋子一共有几扇门,居然有七扇之多——“这是外祖父为地下党开展工作专门设计的,就是为了出现突发状况时,大家能及时安全转移。”

在红楼的采访,恰逢来自四平东道小学的少先队员来这里开展“行走的思政课”。郑吉安被大家“认出”身份,她也即兴在院子里给大家介绍吉鸿昌将军的故事。从那一只刻着“作(做)官即不许发财”的瓷碗,说到挂在胸前的“我是中国人”木牌,孩子们的眼光似乎更加明亮。

“当前青少年普遍成长于幸福环境中,对革命先烈和历史人物了解有限,仅靠课本介绍难以深入理解。现在,通过实地、实物、沉浸式等多元方式,加强真实革命传统教育。”作为天津市关工委德育部部长,郑吉安深有感触。

抚摸着院中石碑,上面镌刻着取自将军遗书中的“为时代而牺牲”的亲笔,郑吉安低头轻语:“清明时节,我们更加缅怀您。您看,这幸福生活、这盛世中国——如您所愿!”

记者 单炜炜

赵天麟

**王凯捷:他确立了耀华“勤朴忠诚”的校训**

初春时节,津城草木焕新。3月29日,记者走进耀华中学,在赵天麟烈士铜像前,专访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王凯捷,聆听革命烈士赵天麟的抗日英雄事迹,感受这位爱国教育家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。

“国难当头,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,用身躯为青年学子筑起防护屏障。”站在烈士铜像前,王凯捷满怀崇敬,追忆那段烽火岁月里的热血故事。赵天麟于1886年生于天津,作为天津首批公派留美学生,他获哈佛大学法律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,先后在北洋大学执教治校,深耕教育与实践。1916年天津“老西开事件”爆发,他主动带领民众奋起抗争,用实际行动彰显了赤诚的家国担当。

1934年,赵天麟担任耀华学校校长,确立“勤朴忠诚”校训,为学校注入了深厚的精神底蕴。王凯捷表示,在抗战烽火中,这座校园悄然成为天津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。

1937年七七事变后,南开大学、南开中学校舍遭日军炸毁,大批师生流离失所。为让学子重返课堂,赵天麟顶住各方压力,在耀华开设“特班”,收留失学师生。凭借校园地处租界的优势,他将这里打造成秘密抗日阵地,支持各类抗日进步组织开展活动。

在王凯捷的讲述中,赵天麟坚守民族气节的细节令人动容。面对日军强行推行的奴化教育,他坚决抵制,坚持教授中华传统文化,保留课本爱国内容,节日里坚持带领师生升国旗、唱国歌。他不顾个人安危,多次秘密护送被日军通缉的爱国学生离开沦陷区,全力守护青年抗日力量。即便频频收到死亡威胁,他依旧从容应对并提前立下遗嘱,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,尽显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。

1938年6月27日清晨,赵天麟在前往学校途中,遭日本特务枪击,壮烈牺牲,年仅52岁,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爱国誓言。1992年,他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;1995年,耀华中学为其矗立铜像,让这位爱国校长永远守护着他倾注毕生心血的校园。

从投身教育兴邦,到参与爱国抗争;从庇护流离学子,到壮烈以身殉国,赵天麟的一生,始终与民族命运、城市安危紧密相连。他以生命诠释使命,用坚守捍卫家国,用一腔热血铸就了不朽的民族精神丰碑。王凯捷感慨,赵天麟烈士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,早已融入天津城市精神,成为激励一代代津城儿女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,这如先烈所愿的盛世,便是对英魂最好的告慰。

记者 姚华

8

山河忆英魂

人间系故情

清明特刊

《今晚报》

2026年4月7日 星期六

责任编辑：王永波 美术编辑：苑靖

9



制图 苑靖

安幸生

**新婚33天即被捕 大声说“我信仰共产主义”**

又是一年清明节。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中河头村,春风拂过安幸生烈士故居的青砖黛瓦。中河头村是天津第一个农民党支部的诞生地,这座庄严肃穆的院落,是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这里的一砖一瓦、一件件旧物,都在无声诉说着津门革命先驱安幸生那短暂而壮烈的一生。

“讲好烈士的故事,让红色基因在天津代代相传,是我们的责任。”作为安幸生烈士故居的负责人,杨波常年驻守于此。他手捧那份纸张已然泛黄的革命烈士证明书,目光坚定。证书上“安幸生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”的字迹,清晰如昨。

“安幸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天津人,1902年出生在我们中河头村。”杨波指着故居介绍说。这座三合院,是烈士成长的摇篮,也历经沧桑——1938年遭日军焚毁,后由族人重建,解放后还曾作为野战医院、村办学校使用。岁月变迁,但烈士的印记,已深深烙在这片土地。

安幸生出身乡绅家庭,自幼接受新学,早早立下救国志向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,在天津求学的他立刻投身洪流,与周恩来、邓颖超等并肩战斗,参与筹建天津学生联合会,组织罢课游行,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坚。他与于方舟等人组织“新生社”,创办《新生》杂志,传播马克思主义,被誉为天津学运“四大金刚”之一。“更重要的身份,他是天津籍第一位中共党员,也是天津总工会首任委员长。”杨波强调。1922年,在李大钊介绍指导下,安幸生加入中国共产党,毅然扛起天津工人运动的大旗。他深入码头、纱厂,与工人同甘共苦,宣传革命真理。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,他组织领导了持续三个月的天津海员大罢工,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,极大鼓舞了工人阶级的斗志。他曾作为天津地区唯一代表出席中共五大,其间七次被捕,始终信仰如钢,毫不动摇。

最令人动容的是安幸生短暂的生命与爱情。1927年,安幸生奉命赴京参与恢复中共北方局工作。其间,经蔡和森介绍,他与女共产党员董恂如结为革命伴侣。然而,婚后仅33天,因叛徒出卖,安幸生不幸被捕。狱中,面对酷刑与利诱,他大义凛然:“我信仰共产主义,是在孙中山先生联共政策下加入中国共产党,的别无可奉告。”同年11月11日深夜,安幸生在北京安定门外英勇就义,年仅25岁。

1949年12月,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安幸生等十八烈士移葬仪式。周恩来总理亲自主祭,并含泪与董恂如一同抬起安幸生的骨殖坛,缓步安葬。他轻声说:“我们好好抬着我们的战友、同志、亲人吧。”这一幕,成了对先烈最深沉的告慰。

从爱国学子到工运领袖,再到坚贞不屈的革命者,安幸生用25年的生命,践行了“为人民谋幸福”的初心。

魏士毅

**带病走上街头举旗示威 与刘和珍一同遇难**

读过鲁迅先生《纪念刘和珍君》一文的人,都知道刘和珍是“三一八”惨案中牺牲的青年女烈士。其实,在那场血腥的屠杀中,还有一位来自天津的年轻女性,与刘和珍一同倒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的血泊中。她叫魏士毅,那年刚满22岁。清明将近,记者联系到了魏士毅女士的侄女、87岁的老人魏如玲,听她讲述姑姑的故事。

“我小的时候很少听奶奶或是父亲提起我这位姑姑,或许是姑姑的牺牲让亲人大悲痛了,大家不忍反复提及。”魏如玲曾是天津市南开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,有天她下班后无意中看到,家中收到了一本纪念“三一八”烈士的书。“我翻开一看,里面就有姑姑的事迹,而且我爸爸也在里面写了文章,回忆自己的姐姐。”

魏如玲介绍,魏士毅是家中的长姐,在弟弟妹妹眼中,她是一个性情温厚的大姐,不仅生活上对姐妹关心备至,而且很看重他们的功课,也经常讲爱国故事给他们听。“1923年是当时家里孩子们开学‘大丰收’的一年,我的两位姑姑先后考上燕大预科与新成立的南开女中,但是我爸当时因病耽误了很多功课,连考上中学都觉得高不可攀。”

面对沮丧的弟弟,魏士毅认真帮他分析短板,并说服父亲让弟弟上暑假学校补课,日日陪弟弟去上学。“后来我爸爸顺利考取了南开中学、唐山交通大学,参加工作后又成为天津大学物理系一名教授,一生投身于教学与学术研究。”说罢,魏如玲念出了父亲在回忆录中写的一句话,“怎能忘记姐姐对我的恩情啊!”

1926年春节过后,患有严重胃病的魏士毅,仍坚持回北京上学。3月18日晚,家中突然收到学校发来的极大鼓舞了工人阶级的斗志。他曾作为天津地区唯一代表出席中共五大,其间七次被捕,始终信仰如钢,毫不动摇。最令人动容的是安幸生短暂的生命与爱情。1927年,安幸生奉命赴京参与恢复中共北方局工作。其间,经蔡和森介绍,他与女共产党员董恂如结为革命伴侣。然而,婚后仅33天,因叛徒出卖,安幸生不幸被捕。狱中,面对酷刑与利诱,他大义凛然:“我信仰共产主义,是在孙中山先生联共政策下加入中国共产党,的别无可奉告。”同年11月11日深夜,安幸生在北京安定门外英勇就义,年仅25岁。

1949年12月,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安幸生等十八烈士移葬仪式。周恩来总理亲自主祭,并含泪与董恂如一同抬起安幸生的骨殖坛,缓步安葬。他轻声说:“我们好好抬着我们的战友、同志、亲人吧。”这一幕,成了对先烈最深沉的告慰。

从爱国学子到工运领袖,再到坚贞不屈的革命者,安幸生用25年的生命,践行了“为人民谋幸福”的初心。又是一年清明节。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中河头村,春风拂过安幸生烈士故居的青砖黛瓦。中河头村是天津第一个农民党支部的诞生地,这座庄严肃穆的院落,是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这里的一砖一瓦、一件件旧物,都在无声诉说着津门革命先驱安幸生那短暂而壮烈的一生。

董健民

**将党的密件紧贴于胸 怀抱幼子纵身跃入大海**

3月末的静海,春风吹绿运河两岸。在静海区蔡公庄镇刘祥庄路口,远远便望见一座灰色二层小楼,静默伫立在麦田与村落之间。这里便是董健民烈士事迹纪念馆,也是中共机要密码、国家安全战线的革命先烈代表人物——董健民烈士的故乡。

推开展厅大门,时间仿佛瞬间凝固。董健民的半身雕像前,鲜花层层叠叠,每一束都是后来者无声的致敬。雕像的身后,“誓与密码共存亡”七个大字,在射灯下熠熠生辉。

静海区蔡公庄镇人大主席曲维敏带着记者一边参观,一边讲述董健民烈士生活、学习、工作、成长以及全家为革命牺牲的英雄壮举。

董健民,1923年出生于此。他的家族《董氏族谱》开篇八字“精忠报国、笃实为民”,像一粒种子早早埋进她的生命里。真正引领她走上革命路的,是中共地下党员、叔叔董秋斯。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,这个性子倔强的静海姑娘,和两位姐姐一同踏上了奔赴延安之路。

展厅里的一张地图,用红色箭头勾勒出董健民和大姐董清民、堂姐董仲民在1939年的春天,从天津乘船至香港,随南洋华侨司机归国服务团,辗转广西凭祥、贵州贵阳,再北上西安,最后徒步300多公里抵达延安——整整八个月,辗转两万里。大姐董清民没能走完全程,病痛与劳累将她永远留在了路上。

在延安,董健民和堂姐董仲民先后入党。1941年,姐妹俩被调入中央社会部机要科担任译电员,李克农亲自为她们起了代号“大董”“小董”。周恩来长期在重庆,与党中央的电报昼夜不断,董健民与爱人钟琪在枣园的窑洞里,一字一字将关乎国家命运的秘密准确无误地传递出去。

1942年,李克农为这对革命情侣主持了婚礼。没有盛大的仪式,却有最坚定的信仰。

1946年秋,党中央决定在大连建立秘密电台,加强与东北根据地的联系。李克农慎重考虑后,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董健民和钟琪。他们带着不满两岁的儿子明明,踏上新的征程。

谁也没有想到,最后的考验,在海上。1946年11月7日,他们乘坐的商船驶入渤海海域,突遭国民党军舰拦截。炮弹击中商船,明明头部被弹片划伤。后来敌人要登船搜查,在这紧要关头,夫妻二人做出了选择:他们将党的密件紧紧贴在胸前,一家三口紧紧抱在一起,纵身跃入波涛汹涌的大海。

那一年,董健民23岁。由于隐蔽战线的特殊性,英雄的故事曾长期不为人知。在展厅里,央视《永远的丰碑》栏目播出的专题片循环播放,让这段悲壮往事一点一点被世人看见。

渤海波涛从未远去,它记得一个静海儿女最后的倔强,也见证着她用生命守护的这片土地,正一天天,变成她梦想中的模样。

记者 侯蕾

记者 董欣妍

记者 付殿秀